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

杨永清^{1,2}, 陈加飞²

(1.西昌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四川 西昌 615013;2.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 610000)

摘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论述为考察对象,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形成为线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出发,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与作用,在分析科学发展观理论渊源的同时,详尽阐释了十八大以来关于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并从“核心理念”、“理论品格”与“理论形态”三个层面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作了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以人为本;核心立场;思想路线;精神实质;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3-0021-04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n the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 Yong-qing^{1,2}, CHEN Jia-fei²

(1.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Concentrating on the rece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esis st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people-oriented"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xplains the most distinctive spirit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re idea", "character theory" and "theory of form", the thesis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n "Chinese Socialism Theory".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a guide to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 modern enterprise.

Key words: people-oriented; core position; ideological line; spiritual essenc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有生命力的思想,往往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样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层面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特色道路已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针对十八大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容及其贡献所进行的系列新阐释,其意义重大。将“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至“核心立场”,确显其指导地位的方向性、发展阶段的过程性与践行信念的坚定性;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要义上升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实”,不仅是对原有理论精髓的拓展,也是不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理的融合与贯通;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理论高度^[2]。如何认识与理解这些新思想、新论断,尤其是这个“最新成果”?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任何一个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理论路径。对于“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而言,关键在于理论本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贡献,它不但是过往经验的总结与教训的借鉴,更是对现实的洞悉与发展的前瞻。作为理论发展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和“精神实质”这两个理论支点,不

但在理论形态上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对理论宝库的丰富功不可没。

于此,本文就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最新论断为考察前提,并基于其理论形成路径与线索,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从“核心理念”、“理论品格”与“理论形态”三个层面全面阐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

一、“以人为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理念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面对多元的价值诉求与复杂的思想环境。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以及所制定的系列方针、政策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一些困境与问题而受到了质疑。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现实的严峻考验,针对来自对党的宗旨的怀疑论调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要求,“以人为本”的核心观,既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规定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党十七大以来的新问题、新经验,针对理论学术界对“以人为本”内涵的长期争论,特别是对其核心地位的质疑,党的十八大将“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核心立场”的高度^[1],要求“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这不仅要求在未来的具体经济工作与各方面实践中必须贯彻落实我党宗旨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更为重要的是将“以人为本”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充分表明了我党在对待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面前的一贯立场。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之“本”就是“立场”之意,是针对社会发展实际中重“物”轻“人”的批判和超越,旨在破除GDP崇拜,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努力实现人民幸福。

不过,关于“以人为本”中的“人”却是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观点。一是将“人”视为抽象的、类本质的人;二是将“人”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民”;三是把“人”定格为具体的人、现实中的人;四是将“人”泛指为每个有生命存在的人,是一切人。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人们在发展面前怎么看待“人”的问题。为了厘清“以人为本”中的“人”的认识,下面我们从三个层次加以阐释:第一,“人”是人民群众的代称,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这一基本原理,这就解决了发展中“依靠谁”的问题。第二,“人”是一个集合的单项体即具体的“每个

人”,他是集权、责、利等于一身的社会公民,这就体现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及其方法论要求,而非从“抽象”或“纯粹思想”的“人”出发。最后,“人”直接指向了发展中的“见物不见人”、“以‘物’为本”的“物象”,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就解决了发展中“为了谁”的问题。值得一提是,我们在理解“以人为本”时,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现代化建设实际,对两者加以合理“扬弃”。“以人为本”是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一体的科学命题,总体上要求把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评价尺度、核心立场,客观上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必须把“依靠谁、为了谁”统一并置于首位,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地位”,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起,我们党就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身的首要任务。无论是革命、建设与发展,我们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视为党追求的目标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充分信任。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党的宗旨,实际就是将人的事业视为党的事业。自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利益格局多元化,如何处理人民利益与国家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2]”作了明确的阐释,并要求以此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党章。自此,“以人为本”这一命题虽没有直接产生于三代领导集体,但其理论的核心无不蕴含着“以人为本”之思想。伴随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力度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在曾经的一路凯歌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发展压力与环境承载、经济增速与资源耗损、粮食安全与生态危机、就业失业与两级分化、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等问题无不困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针对社会主义事业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洞悉国际国内实情下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目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等角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为了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发扬光大,习近平对“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内涵上的提升。在进行一系列民族与国

家的战略决策与部署中,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习近平认为,“以人为本”就是要将党的目标与人民目标连在一体,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自始至终依靠人民,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之梦,才能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守和拓展。

作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理念的“以人为本”,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化进程中的光辉典范。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一直以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火焰鼎盛,是因为它有着“依靠谁”“为了谁”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立场,并始终代表着底层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利益,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的终极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言,旧社会与旧制度之所以能被消灭,主要在于新的“联合体”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所以,“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理念,而且要求党的具体方针制定和各项工作实施的前提必须始终以人的发展为条件。

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格”

理论品格是理论之树常青的生命力。我们党正是通过不断地理论创新保持了理论发展的原动力。作为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2],正是我们党在十八大结合新形势、总结新经验、提升科学发展观新境界的理论诉求,充分诠释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核心价值的丰富、发展和凝练,是推进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贡献。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格”。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作为“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从毛泽东1929年首次使用“思想路线”概念开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其理论发展内涵随着革命、建设与改革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与完善的发展过程。即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过程。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总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精髓——“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伊始,面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是否能顺利推进的关键,要贯彻“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拓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02

年党的十六大针对国内外形势的风云变换,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先进性与创造力注入了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不但要求全党从理论上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要求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先进性。在不断总结新经验并结合新形势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将“求真务实”增添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突出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中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性。至此,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使之处于一个辩证的运动关系之中。

作为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品格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提升与完善,才能永葆理论的青春,才能不断指导变化的实践,这也是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任何理论的产生,其精髓都会烙上时代的印记,都是特定时代具体内容的特定产物^[4]。我们党正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系列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在中国化进程中得以提升与发展,不过,贯彻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可以说,党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脉相承的集中概括。作为新时期思想路线“精神实质”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作为新时期理论创新继往开来的集中体现,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创新与发展的理论本色。

之所以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源于“一脉相承”是其共同的活力基因,并贯通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中。“一脉相承”不但体现在“理论渊源”与“理论目标”,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主题”与“理论基点”上,他们除了有着“共同规定性”外,还包括“理论品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对“精神实质”的集中展现。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产生之时起胡锦涛就对其“理论品格”进行了科学的阐释,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重点强调了“理论品格”的“一脉相承性”^[5],进一步肯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地位,提升与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这不但打开了人们认识与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视野,提炼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而且将“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面对当前国内改革困境与国际复杂局势,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理论品格”的价值诉求进一步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无不内涵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中国梦”、“群众路线”、“三严三实”等其理论精髓与实践要义始终贯通于科学发展观。同时,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所作出的“顶层设计”和“十三五”规划等,也无不是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理论形态是理论的表现形式,是思想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反映与存在方式,它既决定于实践运动的科学轨迹,又决定理论本质发展的历史逻辑。作为实践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个自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体系。十八大对科学发展观地位的肯定,实现了从“重大战略思想”到“指导思想”的理论提升,从理论上为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形态,实现了党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事实上,我们党的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绝非是党的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的逻辑结果,而是有着丰富的经验材料和鲜活的实践依据。党的十七大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困境,及时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这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丰富,是基于解决经济社会与人发展矛盾和冲突的理论提升。为了将其重大“理论成果”理论形态有效实践化,党从坚持基本路线、构建和谐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四项要求”^[2]。它不但要求全党同志要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深刻理解,而且还应增强其理论与实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开创理论与实践运动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了使在实践中得以检验的科学发展观在不断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中发挥其应有的理论价值。为此,在部署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中,党的十八大用了“四个更加自觉”^[3],并从“第一要义、核心立场、基本要求与根本方法”四个层次提出了明确要求。“四个更加自觉”生动地诠释了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意义,进一步加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形态的科学性。

作为理论与实践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不仅体现了学术的指向性,而且明确了运动的使命与制度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和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学说”^[6]。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深入考察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因素,使之意识到实现历史使命应具备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7]。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基本内涵,而且从实践的时代特征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达到了高度契合。社会主义理论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则上不能脱离其鲜活的实践运动,应伴随着每一次运动的重大跃进,不断概括总结出阶段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阶段成果,不但拓展了理论视野,而且还使“理论体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并与“道路”、“制度”一起成为我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不仅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之间的地位和功能^[8],而且指出了三者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动”轨迹与“制度”存在方式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其中,作为理论层面体现的“行动指南”,它是一种不断在实践中丰富的理论系统,必将随着现实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与提升。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结晶,更为重要的是其“核心理念”、“理论品格”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形态”。虽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集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的现实的理论问题,且两大理论成果也内涵了发展的精神,但发展的精髓特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却是体现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中。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临近时期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最新理论成果的肯定和对经济社会建设地位的确立与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演变进程、精神内核和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也正是因为对此文献综述的研究,也使笔者陷入了思考。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智慧,并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它的产生是国内学者对生态环境关注的结果,也为我们人类的长远发展提出了建议。但在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过于分散,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进行系统研究,且研究深度不够。最重要

的是国内学者对于绿色发展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上,虽说有些著作中提出了一些的启示和建议,但还是处于理论上,很难落实。

很多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专攻,希望能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上能有更多的学者对绿色发展观有更多的研究。对于在研究方法上的比较定性,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更多更灵活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上,采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最好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用一种比较“接地气儿”的方式引导人们对绿色发展观进行关注,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共同为我们人类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31.
- [2]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48-49.
- [3] 白瑞,秦书生.论我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J].经济纵横理论月刊,2012(7).
- [4] 傅晓华.可持续发展之人文生态——兼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5] 王永芹.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 [6] 张治忠.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价值维度[J].求索,2014(12).
- [7] 陈凡,白瑞.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历史演进[J].学术论坛,2013(4).
- [8] 黄志斌,沈琳,袁蛟姣.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时代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8).
-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26.
- [10] 张治忠.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结构体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 [12] 张治忠.追求人文与生态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精神内核[J].云梦学刊,2015(5).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24页)

注释:

- ①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②“四项要求”:即“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 ③“四个更加自觉”:指“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3-25.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 [5]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3-16.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0.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3.
- [8] 丁俊萍,于海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历史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2013(6):26-32.

(责任编辑:董应龙)